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伍廷芳博士及证道学 (神智学) 在中国的历史
(最新改动：2025年11月29日)

在证道学的纪事录里，关于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的资料寥寥无几，只有一篇 Josephine Ransom 女士在1922年所写的“证道学简史”有一些简短描述：

“中国的第一个学会由德高望重的政府高官及外交家伍廷芳博士建立并任会长。但他于六月不幸去世。伍博士迫切希望证道学能在他的祖国扎根。他希望新中国能建立在“世人皆兄弟的信念”之上。”

在 C. Jinarajadasa 所著的“证道学金色年鉴”第204页，有一张照片及注释：“伍廷芳博士，中国第一部证道学手册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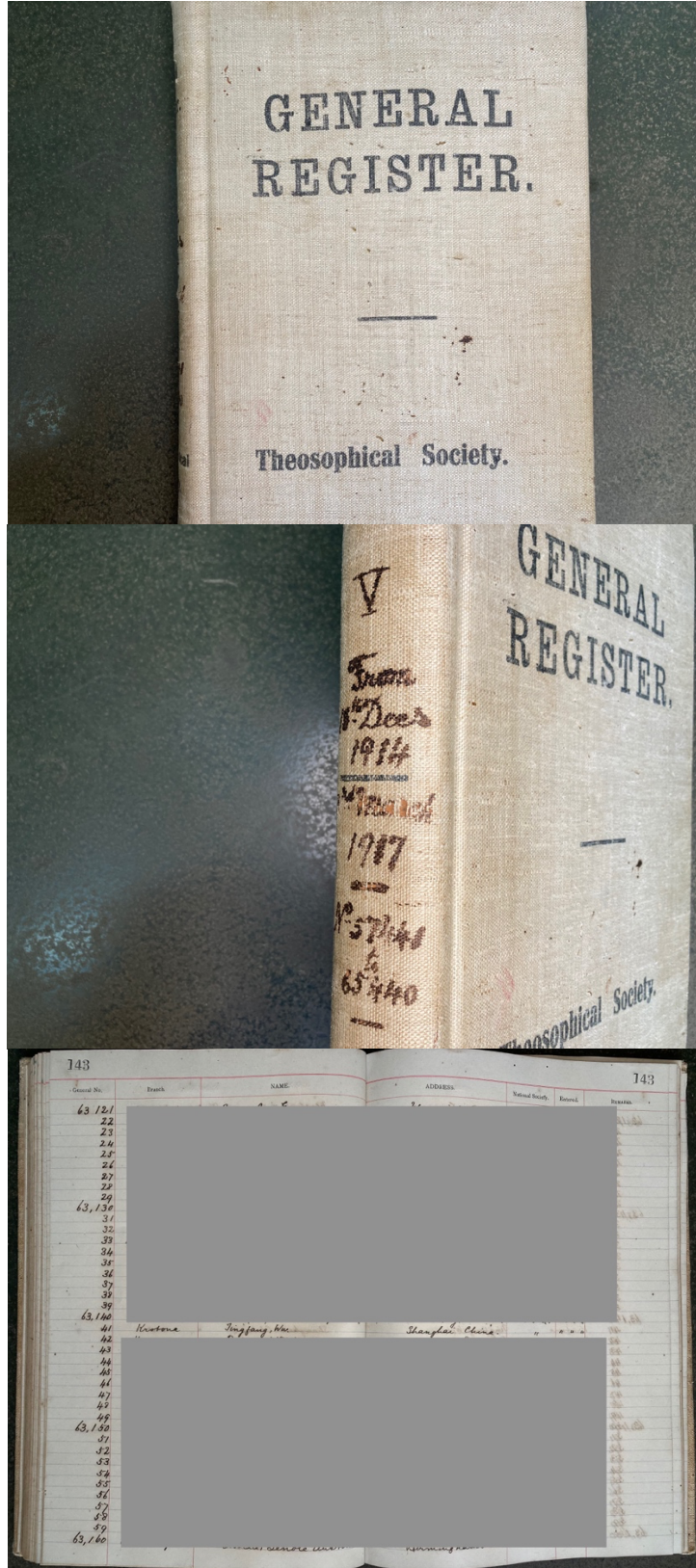
尽管信息很少，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有几个在总部注册的分会 (会所)：

Lodge Name / 分会名称	Location / 地点	Date of Charter / 成立日
The Saturn 土星分会	Shanghai 上海	14/1/1920 1920年1月14日
The Sun 太阳分会	Shanghai 上海	8/8/1922 1922年8月8日
Shanghai (ex-Saturn) 上海分会 (前土星分会)	Shanghai 上海	8/2/1923 1923年2月8日
Hankow 汉口分会	Hankow 汉口	7/7/1923 1923年7月7日
Hong Kong 香港分会	Hong Kong 香港	7/9/1923 1923年9月7日
Dawn 黎明分会	Shanghai 上海	12/11/1924 1924年11月12日
Blavatsky (Russian) 布拉瓦茨基分会 (俄语)	Shanghai 上海	7/1/1925 1925年1月7日
China (ex-Sun) 中国分会 (前太阳分会)	Shanghai 上海	7/4/1925 1925年4月7日
Tientsin (Russian) 天津分会 (俄语)	Tientsin 天津	1/6/1925 1925年6月1日
North China 北中国分会	Tientsin 天津	24/8/1925 1925年8月24日
上海 (ex-Shanghai 前上海)	Shanghai 上海	9/9/1931 1931年9月9日

在中国第一个分会成立之前，有一些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他们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证道学学会会员。他们是“隶属于其他分会的学会成员”。伍廷芳博士便是其中之一，他于1916年8月23日加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还有哈里·普拉萨德·夏斯特里 (Hari Prasad Shastri) 先生，他于1914年2月16日加入印度北方邦莫拉达巴德的善道分会 (Shantidavada Lodge, Moradabad, Uttar Pradesh)。除了太阳分会之外，几乎所有的分会都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组建的。会所的会议和活动都以负责的外籍人士的语言进行。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伍廷芳加入证道学学会的登记记录 (1916 年 8 月 23 日)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在中国第一个获得创立许可的分会是由一批在上海的包括伍廷芳在内的人发起的，当时伍廷芳是孙中山的外交部长。1919年7月6日，临时秘书西姆斯（R. Sims）写信提议成立土星分会，如下。

"几个月前，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研究证道学的小组。在上次会议中，大家决定成立一个分会，并申请特许状。因此，请您在方便时尽早提供给我们一份结社宪章申请表。我们将从14名成员开始建立分会，其中4名是有多年资历的证道学学会会员。上海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我们希望分会能帮助许多人转向正确的方向。

随附七份入会申请表以及\$G19.50的汇款。"

4名深资的学会会员指的是当时隶属于其他国家的学会的一些会员，可能包括伍廷芳博士和Hari Prasad Shastri教授。

这封最初的申请信被误寄至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而非总部阿迪亚。这可能是因为伍廷芳博士是克罗托纳分会的成员，他们是从他那里获取的地址。尽管如此，该信件仍被转寄，并于1919年11月29日——约五个月后——被阿迪亚收到。

然后，有一封跟进此事的信被寄到阿迪亚，这封在1919年12月20日由S. Flemons作为名誉秘书签署的正式申请书中写道：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在上海成立了一个证道学分会，我相信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证道学分会"。

我们对章程和入会证一事颇感焦虑，因我们误将申请提交至美国克罗托纳分会而非贵处，导致延误良久。随后我们收到福斯特·贝利先生的回复（Foster Bailey），说明我们本应向阿迪亚总部提交申请，但他已将我们的信函、申请表格及17.50金\$转交贵处。恳请您尽早将特许状和入会证寄至我的地址，谨此致谢。

我们的前任名誉秘书R·西姆斯（R. Sims）兄弟已启程回国休假，我有幸被选为接替人选。

我很高兴地告知您，本会所进展迅速，目前已有更多申请表填写完毕，我将暂缓处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理直至收到您的回复。烦请告知每份入会申请及每位会员年度会费所需汇款的具体卢比金额。

若您能惠赐学会在售书籍的目录，我将不胜感激。

请为我们办理《证道学》杂志的订阅手续，并于来函时告知订阅金额。

我们将会所命名为“土星分会”，因为会所成立时是在土星行运的影响下。”

1920年1月14日，总部向土星会所发了成立特许状以及七份入会证书。土星会所于是成了中国第一个被授予学会特许状的会所。一份特许状副本于1920年6月8日被寄到上海给最初的会员Captain George W. Carter和夫人、Mary E Lane夫人、Rosine Thavanet Williams夫人、M.V.Andrews小姐、Sims先生和夫人、H. Shastri、S. Flemons、S. Wolfe、Olsufieff先生和夫人、Shibbeth小姐等人。

关于当时中国学会会员的情况，查尔斯·司布真·梅德赫斯特牧师（Rev. Charles Spurgeon Medhurst）致函时任阿迪亚国际记录秘书的J·R·阿里亚（J.R.Aria）弟兄的信函最为详尽。这位来自美国的早期会员兼传教士，于1920年3月20日自北京寄出信函。

“若您能成为中国各地散居的证道学学者的中枢，我将深感欣慰。我们身处广袤大陆，相隔千里之遥，若非偶然相遇，甚至无从知晓彼此的存在。

例如，我在二月刊上看到一则通告，称上海新成立的分会获得了特许状。我自然希望能与这些新会员取得联系，但手头既无姓名也无地址。他们大概也不知晓我的行踪。

伍廷芳博士在香港偶然遇见一位年迈的证道学学者，此人是我们二人素未谋面的。我认为伦敦传道会（L.M.S.）派驻中国中部的麦克法兰先生（Alfred J. MacFarlane）亦是证道学学会会员，但对其了解甚少。

或许还有其他人。今天，若您能让我们聚在一起，互相介绍彼此，我们或许能联合力量并采取行动，但除非您告诉我们谁是谁，否则我们无法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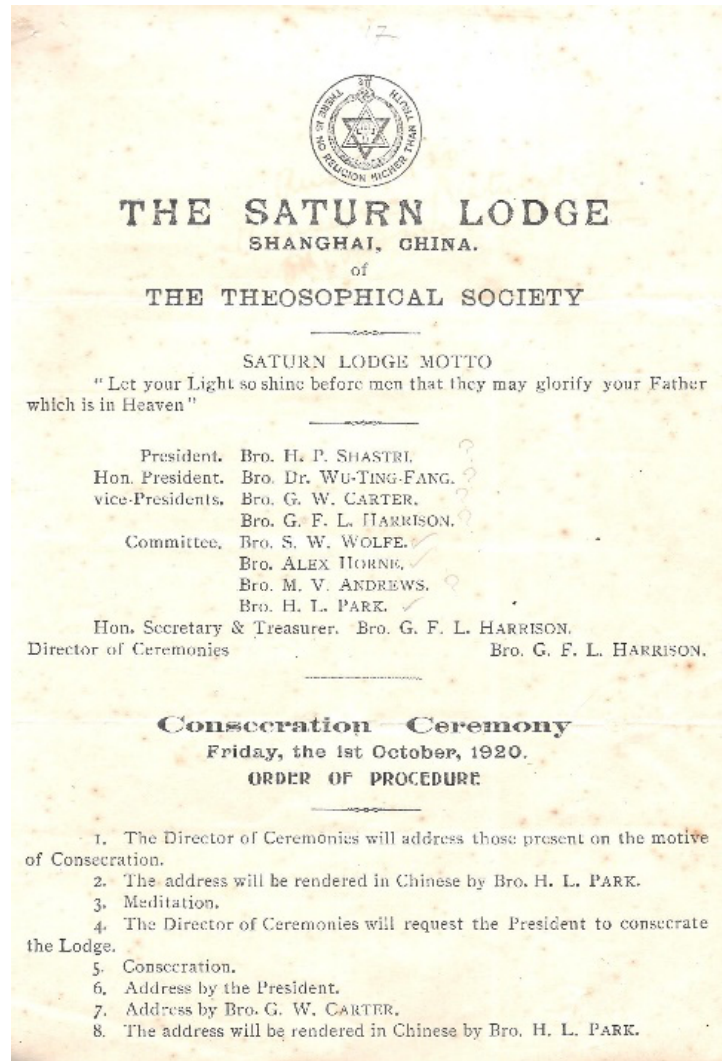
前些日子收到您来信介绍卡辛斯教授（Cousins），我深感欣喜，可惜他离北京最近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时也远在三百英里之外。不过据我所知，他与伍博士会面了。”

显然，伍廷芳博士虽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但他显然在土星分会的幕后非常活跃。在哈里森 (G.F.L. Harrison) 于 1920 年 9 月 17 日以名誉秘书的身份写的一封信中，他称伍廷芳博士为名誉会长。事实上，在 1920 年 10 月 1 日的会所开幕仪式节目单上，伍廷芳博士被称为荣誉会长。



在 1920 年 10 月 8 日的信中，G.F.L. Harrison 报告说：

“下周日，10 月 10 日，我们将举行第一次中国会员会议。会议将用中文进行，我们的名誉会长伍廷芳博士将发表开幕演说。我会告诉你们我们的进展情况，并在我们的分会季刊发行后寄给你们一份，里面会有详细的报道”。

G.F.L. Harrison 在 1920 年 12 月 29 日的信中写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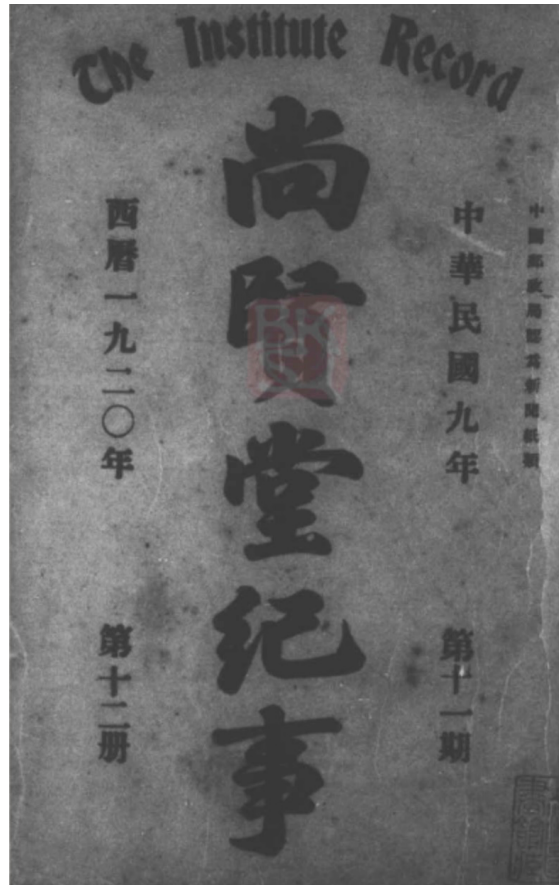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几周前，我们的名誉会长伍廷芳博士用中文做了一场关于证道学的公开讲座。我们有大约 500 名听众，这标志着我们第一次尝试在中国人中间开展宣传工作，而且非常成功。

不幸的是，伍博士不得不前往广东，因此这项工作暂时停止了。等他回来后，我们希望进一步开展工作。我想说的是，他的演讲被刊登在上海所有主要的中文报纸上，因此那些没有到场的人有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读到一些关于证道学的东西"。

尚贤堂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 的期刊中就记载了这一事件。据报道，这次公开演讲于 1920 年 12 月在上海海宁路新爱伦影剧院 ([New Helen Theatre](#)) 举行，讲座的主题是《生死之理》，听众多达 1 000 人。



第一本中文版的证道学文献于 1920 年 12 月印刷。这是一份 3 页的文件，译自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好莱坞克罗托纳区证道学学会全国宣传部 (National Publicity Department, Theosophical Society, Krotona, Hollywoo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提供的证道学小册子。当时，证道学学会的中文名称是道德通神学。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GROUP AT A SATURN LODGE MEETING (LATER, SHANGHAI & SUN LODGES)

中国证道学学会土星分会活动照

伍廷芳博士，第二排左起第6位，他左侧为 Hari Prasad Shastri 教授
(可能摄于 1920 年 9 月 10 日)

谁是伍廷芳博士？证道学资料对这位在中国的证道学先驱描述甚少。伍廷芳在中国现代史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但很少人知道他的贡献与业绩。根据维基百科，“伍廷芳是一位中国外交官及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并在民国初年简短担任代总理。他是一位律师及书法家”。中文版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对伍廷芳杰出的一生有更全面的信息。但不为人所知或所述的是伍廷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证道学之父。

伍廷芳生于1842年7月30日，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被称为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三岁时父亲带他回中国，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他早期求学香港。187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于1876年于林肯律师会所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成立于纽约的证道学当时在英国很受人瞩目，伍廷芳恰好当时在英国。他是否与证道学会的早期会员有接触，我们不得而知。

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后，伍廷芳回到香港开始了法律生涯。伍廷芳是第一位由英国政府任命为香港立法会非官方会员的华人，他于1880-1882年担任此职。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1896-1902期间，伍廷芳由清朝光绪皇帝委任为大清驻美，西班牙及秘鲁的大使。他于1907-1909年再次赴美担任清朝驻美，墨西哥，秘鲁及古巴的大使。再此期间，他结识了罗斯福总统及科学家与发明家爱迪生。1910年，伍廷芳离美赴北京，途经欧洲，新加坡及香港。

伍廷芳在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首个任期内，于1900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他在美国声望与人气达到顶峰之际。1900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他受邀前往该校发表演说。此次访问期间，他获颁荣誉学位。演讲题为《美国与东方的恰当关系》，伍廷芳借此向美国听众阐释中国文化与历史——这正是他担任大使期间常履行的职责。他在美期间广受民众爱戴，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纷纷致以崇高礼遇。该学位旨在表彰其外交成就及弥合中美文化鸿沟的努力。典礼上校方不仅称赞伍廷芳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更盛赞这位“外国宾客”以“令人瞩目的典范展现了对我国的友好情谊”。

伍廷芳于1901年获芝加哥大学授予第二个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正担任钦差驻美公使。他访问芝加哥及该校引发媒体广泛关注。1901年3月19日，伍廷芳在该校斯图德贝克剧院发表毕业典礼演讲。演讲聚焦中国文明，他指出尽管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其精妙程度毫不逊色。此次访问及演讲被《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广泛报道，标题如《伍公使在芝加哥》。在芝加哥的三天停留期间，校方为其举办了多场招待会与晚宴。这位以魅力与机智著称的公众人物吸引了大批民众。尽管芝加哥大学后来制定了“除非满足严格学术要求，否则不授予外交官荣誉学位”的政策，但伍廷芳获奖时，此类荣誉授予知名人士尚属常态。该奖项旨在表彰他的法律成就，特别是作为首位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的华裔律师所开创的先河。

伍廷芳于1908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授予的第三个荣誉学位。在其第二任中国驻美公使任期（1907-1909年）期间，他受邀于1908年6月10日为该校毕业典礼致辞。伍廷芳的毕业典礼演讲题为《中美为何应为友邦》，其中强调两国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报纸报道描述了他出席典礼时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介绍他登场时和演讲结束后他所获得的雷鸣般掌声。演讲本身也广受好评。他强调两国相互尊重的重要性，指出：“思想与理想的相互交流，汲取彼此最卓越的精华，终将孕育出崭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文明史册将翻开新篇章，东西方摒弃一切敌意与偏见，不再比拼武力成就，而竞逐和平胜利；唯在传播真理与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光明时勇往直前，唯在确立正义与公理时坚韧不拔。”

此次访问期间，他被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其外交工作及促进中美友好关系所作贡献。他还在校内与中国学生合影留念，彰显其对当时日益发展的学术与外交交流项目的参与。伍廷芳的访问对该校具有重要意义，正值中国学生在该校日益受到欢迎的时期。此次访问巩固了伊利诺伊大学与中国之间的深厚联系，包括设立美国首个外国学生顾问。

伍廷芳作为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其魅力、机智和独特的文化桥梁能力而闻名，尤其在美国与中国的关键时期。他以非传统且富有洞见的风格备受瞩目，成为媒体关注和公众热议的焦点人物。伍廷芳在内地与香港接受融合式教育，精通英语，并持有伦敦林肯律师学院的律师资格。这使他成为中国首位英语流利的驻美大使，能够直接与美国官员及公众沟通。他善于用西方人易于理解的方式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当时盛行的刻板印象与误解。他以机智坦率著称，常受邀在大学、论坛及社交场合演讲，总能与听众互动，妙语连珠。他频繁接受美国媒体采访，却总能巧妙反客为主，最终反倒将记者变成受访者。

伍廷芳的任命正值中国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他的外交努力对建立中美双边关系、确保国家生存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大力维护在美国华侨的权益，并抗议反华措施。

伍廷芳在西方居留时久，英伦四年，美国八年。他的英文造诣及对国际时事的谙熟在他所著的《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一书中可见一斑。这本书可读性很强。有趣的是，他其实是在一位美国女士的再三请求下，盛情难却，才写了她唯一的一本英文书籍。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

“美国人实在值得研究。我在美国两任八年期间，很多人多次请我写下我对美国人的观察与看法。我最初觉得我不太合适：其一是公务甚忙，廖无暇余；其二虽然我去过美国很多地方，也在官方及私人的层面上接触过不同阶层的人，但肯定对某些地区，某些风情知之甚少；其三，虽然我对美国总体充满敬佩，但某些方方面面还有待改进，批评那些对我十分慷慨，礼貌和友善的人实在是我不想做的。为了让我宽心，人们对我说该书的目的是不是片面地或是不公正的去评判美国，只是就事论事，坦诚以对。我有一位女性友人，我向来尊敬她的意见，曾对我说：“我们只要你对美国的人和事做公正及坦诚的描绘，不值得赞美的不要去赞美，需要批评和反对的也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不要犹豫地提出来。我们需要你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以便加以改正。”我十分敬佩我的朋友们的说法，她正是反映了美国人宽广的心胸和气度。在写书的过程中，我时刻遵循着该女士的原则。我毫无顾忌地表达我的看法，但不吹毛求疵。我相信美国读者原谅我的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不是出于草率或恶意。如果我把美国说得天花乱坠，或者见恶不提，那我反倒不是真心诚意了。”

这本书幽默诙谐，时而带讽刺意味，但十分诚恳低调。该书写于1914年。伍廷芳当时已在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担任要职。

我们衷心感谢庄千慧女士（莊千慧 Chuang Chienhui）在《跨越边界的证道学》（*Theosophy across Boundaries*, Hans Martin Krämer & Julian Strube 编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四章《现代中国的证道学运动》（*Theosophical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中提供的信息，本文大量引用了该章节内容。

伍廷芳博士于1910年结束清朝驻美公使任期后返回中国。归国后，他因厌恶清朝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而立即辞职，迁居上海并沉浸于研究证道学。据记载，1910年伍廷芳曾暂停公务。他当时希望“召集上海的中西知识分子共同创立证道学学会，并开展对儒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精髓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他于1916年8月23日正式加入证道学学会，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的克罗托纳分会会员。尽管有报道称，1916年3月12日伍博士以证道学学者的身份受邀前往上海尚贤堂（中国国际研究院，[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http://www.theinternationalinstituteofchina.com)），为数百名听众发表演讲。

显然，伍博士自1910年代起便开始在中国传播证道学思想。彼时他的证道学宣传活动与三位西方浸信会人士密切相关：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吉尔伯特·里德（Gilbert Reid）及C·斯伯根·梅德赫斯特（C. Spurgeon Medhurst）。其中提摩太·理查德与吉尔伯特·里德虽非证道学会会员，但三人对东西方宗教的见解却惊人相似。梅德赫斯特最初以浸信会传教士身份来华，于1896年10月19日加入美国证道学会，亦应被视为证道学运动在中国的先驱。斯伯根·梅德赫斯特因参与证道学会活动，于1904年被迫辞去牧师职务。《国际证道学年鉴》于1909年首次记载了斯伯真·梅德赫斯特在中国开展的证道学运动。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1911年7月，伍廷芳博士在“首届世界民族大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华文明的论文，安妮·贝森特作为赞助人出席，甘地亦随行。在伦敦举行的此次大会上，伍博士表示更推崇中华文明。他援引儒家经典阐释中华文明理念：“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观点或许与证道学会的第一个宗旨——即“普世兄弟情谊”相呼应。伍博士的论文亦被1911年10月出版的《证道人》杂志刊载。伍博士后来表示，他在1911至1912年间辛亥革命成功后，开始钻研道德与宗教领域。

1912年，蒂莫西·理查德、吉尔伯特·里德与斯普尔根·梅德赫斯特在上海创立了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团体（世界宗教会），致力于比较宗教学研究。1913年，斯伯缙·梅德赫斯特——此前曾通过证道学会出版道家经典《道德经》译本——在上海吉伯特·里德创办的中国国际研究院（尚贤堂）发表演讲。他阐述了老子学说中的五大生命追求：“道法自然”、“清静”、“无为而治”、“道生一”及“长生”，这些理念令人联想到证道学中的相似教义。伍博士与梅德赫斯特合作传播证道学思想的首份记录可追溯至1916年1月。与此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晨报》报道称，伍博士与斯伯真·梅德赫斯特在上海创立了宗教研究会。中国国际研究院举办的讲座与演讲对所有国籍人士开放，当地记者常在中文及英文报刊上撰文报道。

自1916年1月起，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在上海中国国际研究院就证道学主题发表演讲。同年3月，《上海时报》刊登了伍廷芳即将举办讲座的公告，称其将以《人的灵魂与肉体之关系》为题，探讨“证道学的另一课题”。《学生杂志》（1916年第3卷第4期）如此报道该讲座：

“三月十二日四时，上海尚贤堂。请通神社伍廷芳君演说人之灵魂与身体之关系。到者数百人。伍君之言曰：人之灵魂，永远不死，无始无终。此即上天所造，特人之身体，如衣服然，不可过于看重，需时加磨练，乃能进化。若磨练数世，变为完全善人，便可得有极乐境界。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余夙讲卫生，自诩可活二百岁，然终有一死。死后灵魂犹在，如人夜睡不过休息身体，而灵魂并不睡，犹能出去作事。如诚心欲见一人，无论远迩，梦中皆可会面。倘日间有事，不能决断，睡时谨记胸中，醒来即可定夺。天下不少奥妙之举，大都视之无形，不知考究，盖有形者为阳，无形者为阴。阴在先而阳在后。人知地球为世界，不知地球外尚有无数世界。凡人喜怒哀乐之气，不但发于一己，且可感触他人。昔余在前清使美多年，回国后每念外国强而我国弱，颇觉热心国事，奏请政府于文教武备，逐一改良，无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如在朝大小诸臣，有谓此项须缓办，此项不宜于中国者，余日居京邸，受其种种腐败习气，而心亦渐馁，乃知国事不可为，始引疾来沪，可见气之感入深也。西人著有一书，系用摄影法照人之气，各图详列。请诸君一览焉。(伍君将书展开，逐页指与在座同阅，共有五十余图)

凡人慈善阴恶，图中皆有形色为分列。末图系向赌博场中所照，中心现圆形，盖赌者一心为利己也，可不惧哉。世人皆昧无形之理，要知身为尘身，尘身之外，包有依达身(注：以太体)，约厚二尺，与尘身一线相连。但隐而不现，凡人将死，灵魂带依达身，脱离尘体，其线始断。特依达身初尚不能远离，常常护其尸体，如人初死，生人偶见黑影，疑为鬼，其实即依达身也，惟不能言。及葬，犹常绕其墓旁，久则依达身亦化去，其灵魂则早至阴间矣，居数十年或数百年不定。如人致祭祖宗，不忘木本水源，孝心实堪敬佩，但其祖宗或早已投胎或至别界，未能必其来享耳。人生无知识者，死后亦鲜知识，可知阴间与阳间无异。特善者复乐，恶者受苦，阴间无烟酒，凡嗜烟酒者，死后不能过瘾，则灵魂受苦。若害人之人，死后良心发现，追悔无及，其苦更不胜数。西国结婚俗尚自由，昔有甲乙二人，与一女咸有爱情，皆思娶之为室，特一女不能嫁两夫，甲私将乙害死，未几甲亦死，此女仍嫁他人。甲乙相会阴间，乙不知为甲所害死也，仍以为良友，欲与接谈，而甲便遁去，盖此时良心发现耳，其愧怍困苦情形，较受官刑尤为难堪。如人心存慈善，灵魂永远安乐。愿诸君仔细思之，善保灵魂，永无苦恼，莫以为虚无而置之脑后也云云。”

伍廷芳在演讲中使用阴阳、气等术语，表明他在向中国人介绍证道学时，将证道学与道家思想相融合。他向听众展示的“西方著作”很可能是C·W·利比德与安妮·贝森特的《思想形状》，但演讲中未提及作者姓名或证道学会。此外，伍氏向与会者展示其收藏的西方灵异照片，以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他唯独未提及什么是证道学。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的传播努力逐渐引起中国关注。1916年，江苏省教育厅特邀伍廷芳以通神会成员身份宣讲证道学(神智学)。“通神学”即证道学当时的中文译名，意为“与神相通”。此次演讲不仅载于江苏教育厅公报，更见诸多家中文报刊。伍廷芳指出，西方科学在东西方均引发了对灵性事务存在的质疑。至于中国，儒家经典《论语》中记载：“孔子不言幽冥之事”，“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孔子并未否认死后生命的存在，但在儒家传统中，对灵性事物的探究并不被重视。伍廷芳在北京的友人于报中读得其证道学讲座的消息，来函质询灵魂之义。该友直言其见解荒谬，与现代化世界格格不入。伍廷芳遂借此问作为引子，在江苏省教育厅发表演说。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答道：此乃深奥之说，书信难尽。若不信鬼神，且问你是否祭祀祖先？祭祖岂非信有鬼神？我们的孔子曾言：“鬼在道德中的作用至大。”这难道不是圣人相信灵体存在的明证吗？至于那些不信者，不过是见识不足，故觉荒诞。若能深入探究，必将豁然开朗。世间诸教，无不承认灵魂的存在。”

伍廷芳关于灵魂的讲座也与他在尚贤堂的朋友们有关。尚贤堂由吉尔伯特·里德创立，是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首次宣讲证道学的地方，亦以促进文化交流、引介各类宗教哲学而闻名。1910年，蒂莫西·理查德出版《大乘佛教的新约》一书。上海权威英文报刊《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以如下方式推介理查德的新作：

“由于证道学以及埃德温·阿诺德的《亚洲之光》——该书成书于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真实关系尚未明晰的时代，普通读者乃至西方那些正在研习佛教的学生，对于佛教在世界宗教中的真实地位仍处于困惑之中。本书收录两部至关重要的译作——其一乃大乘佛教之源流《大乘起信论》，其二为《妙法莲华经》。前者虽曾有英文译本，但译者未能领会一乘真如的佛教真谛；《法华经》译本虽收录在《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却从未被完整译介。此书乃大乘佛教研究者不可或缺之典籍。”

尽管蒂莫西·理查德的佛教译作深受其基督教文化背景影响，但他对东方宗教的看法却与其他鄙视东方宗教的西方浸信会传教士截然不同——他致力于寻求东西方宗教的共通性。朱迪思·C·鲍尔斯 (Judith C. Powles) 指出，即便梅德赫斯特辞去传教职务后，其“挚友”蒂莫西·理查德仍与他保持着联系。可以说，梅德赫斯特与伍廷芳在1910年代中国兴起的证道学运动，得益于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朋友们的支持。但这种合作并非仅源于友谊，更植根于1910年代宗教观念重构的时代浪潮。此外，理查德、里德、梅德赫斯特与伍廷芳于1916年均与日本大乘协会 (Mahayana Association) 有所关联。尽管该协会与证道学会并无直接联系，但其众多西方成员皆为证道学者。证道学思想促使提摩太·理查德等基督教浸信会信徒通过基督教滤镜翻译佛经，同时追求思想统一性。梅德赫斯特的《道德经》译本可视为阐释东西方智慧通性的范例。伍廷芳则试图通过证道学实践化解全球性民族、种族、宗教等冲突，使证道学成为宗教反思的催化剂，并充当东西方思想体系间的调解者。

1916年8月，证道学杂志《轮回》(Reincarnation) 如此描述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的证道学运动：“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工作已在中国的上海顺利启动，目前已有六名成员，一个活跃的团体可能很快就会成立。成员中不乏知名人士，包括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与斯伯真牧师。”同年十一月，阿迪亚证道学学会期刊《证道人》（Theosophist）报道了吴廷芳与梅德赫斯特正筹建证道学研习社（《证道人》第38期[1916]：122页）。

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竭力传播证道学思想，并于1916年组建证道学研究社。然而伍廷芳于1917年加入护法运动，在5月至6月间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理，9月起出任外交部长，因此无法继续留驻上海。梅德赫斯特在上海创立探索社（Quest Society），举办涵盖宗教至炼金术等多元主题的讲座。1918年，上海数名证道学成员参与探索社活动后，随即发起证道学“研习社”。通过这些1910年代的运动，乔治·W·卡特上尉与哈里·普拉萨德·夏斯特里在上海法租界创立了中国首个正式证道学分会——土星分会。该分会最初有十三名成员，一年后发展至二十八人。担任首任分会长的夏斯特里（H. P. Shastri）教授是梵语学者兼皇道瑜伽导师。中国籍成员每周日举办研习会并以中文宣讲证道学。尽管伍廷芳在军阀混战期间事务繁忙，仍持续支持土星分会的运作。该分会首年未设固定会址，夏季时常借用卡特、伍廷芳等成员的住所举行聚会。一年后，伍博士于1920年当选名誉会长。

尽管伍廷芳当时事务繁忙，他仍于1922年在上海创立了由中国人自主运营的首个分会——太阳分会（Sun Lodge）。此外，他以《伍廷芳灵魂学》（Wu Tingfang's theory of soul）开创了中文证道学文献先河，该著作成为首部中文证道学手册。伍廷芳作为孙中山领导的宪政政府成员留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长。广州军政府首领岑春煊强迫伍交出在中国筹建大学的资金，意图挪作军费。伍遂于1920年3月携款离开广州，辗转藏匿香港。在港期间，伍廷芳结识了爱尔兰诗人兼证道学活动家詹姆斯·H·库森斯（James H. Cousins）。伍向库森斯表明愿助力证道学运动，并表示“愿在中国竭尽所能”。伍廷芳出资赞助库森斯在中国进行巡回演讲，金额达2000卢比。当时伍廷芳正为躲避威胁前往上海。两人计划待政治形势好转后，为证道学会开展进一步宣传。然而由于伍廷芳于1922年6月去世，该计划未能实现。

1921年，斯伯根·梅德赫斯特携妻离开上海前往悉尼拜访C·W·利比德。此后他便定居澳大利亚直至离世。伍廷芳与梅德赫斯特的努力极大推动了证道学运动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早期发展；然而随着伍廷芳于1922年逝世，该运动的发展势头逐渐减弱。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1910 年代，伍廷芳强调让中国人相信死后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对死后生命的研究既非迷信，也不应被边缘化。他以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作为切入点，并以自己收藏的西方灵异照片作为佐证。在引介证道学概念前，他必须先阐释死后生命观。1910 年代他关于证道学的中文讲座仅简要提及证道学与证道学会。其首部详细介绍海莲娜·布拉瓦茨基与证道学会的中文著作，是 1921 年出版的《证道学指南》。原因或许可从他 1916 年与印度学者贝诺伊·库马尔·萨尔卡（Benoy Kumar Sarkar）的对话中窥见。伍廷芳问萨尔卡是否知晓 1916 年出版的《证道学指南》：“伍先生笑着说：“是啊。最近我正想着等战争结束后去马德拉斯看看。”当萨卡尔询问这次马德拉斯之行是否属于“朝圣”时，伍先生笑答：“没错。最近我正在研究灵魂、死后世界、轮回转世等概念。我已经戒了鱼肉。我渴望追随你们的佛陀的理想，隐居山林过独居生活。”伍还告诉萨卡尔，他已在中国青年中发起素食运动，倡导改革饮食习惯。为推广此运动，他开了一家餐厅，只卖素食。“但食客寥寥无几，”这位老外交官坦言，“某夜竟遭恶徒纵火焚毁……因此我深感沮丧。”伍以个人遭遇隐喻中国政局动荡，感慨道：“毕竟世间所有改革运动中，先驱者和引路人总要经历这般磨难。”

根据这段对话，伍廷芳对证道学的关注始于他对灵性领域的兴趣，他心中的证道学运动可定义为一场追求进步与社会改革的运动。1910 年伍廷芳归国后，立即创立了素食协会（神智卫生会）。次年他赴伦敦参加“首届世界民族大会”，并宣示其中华文明理想。在英文著作《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1914 年）中，伍廷芳提及安妮·贝森特对其两项主张的支持：移民公民权与素食主义的益处。伍廷芳的政治思想与证道学文献存在显著共性：他反对将儒家思想奉为中国唯一国教，其依据正是证道学倡导的“普世兄弟情谊”理念。耐人寻味的是，伍廷芳博士为贝诺伊·库马尔·萨尔卡著作《印度教视角下的中国宗教》撰写了序言，该书于 1916 年 3 月出版。序言中明确承认：

“法学博士伍廷芳博士，前中国驻华盛顿特使（美国），慷慨为本书撰写了题为《中国人的宗教》的导言。作者谨此感谢这位资深儒学学者所赐的厚谊。

确实，凭借其精湛的英语造诣，伍博士以极清晰且毫不含糊的方式阐释了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顺带一提，他在长达十二页的导论中，还为论述中国宗教体系而适时提及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1918 年前后，上海知识分子开展通灵学研究以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众多知名学者投身通灵学研究，试图将其作为西方新兴科学引入。伍廷芳的灵魂观被用于佐证其理论。他们的研究融合了通灵学探索与传统宗教仪式。新文化运动成员严厉批判这些研究根于迷信——该运动批判传统价值观并倡导西方文明，这导致人们对灵性议题与宗教敬而远之。那些在 1910 年代聆听伍廷芳证道学演讲的听众，或许会产生证道学与通灵学相似的印象。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1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聚焦于“旧”与“新”的冲突，试图探寻国家所需的文明形态。他们热切寻求解决中国两大问题的方案：道德沦丧与精神信仰缺失。这些定义中华文化的尝试，与重新诠释宗教哲学意义的目标交织在一起。在此历史背景下，伍廷芳不仅为证道学会中文名称（译者注：那时叫做“通神会”）先增添“道德”二字，更阐释了死后生命的存在。他鼓励中国人研究世界各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伍廷芳的证道学传播契合时代精神，在其领导下，证道学运动开展了灵性探索、社会改革及反殖民运动。然而此后，中国人将这些活动割裂看待，未能将其视为证道学运动的组成部分。伍廷芳作为中国通灵主义与素食主义的先驱，因争取华侨平等权利的努力而备受推崇。鉴于这些成就均植根于证道学会的宗旨，证道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值得重新评估。

另一方面，证道学者们试图实践的独特的证道学教育之所以失败，主要归因于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局势。证道学会倡导的“普世兄弟情谊”理念是证道学在中国传播的核心特征。从 1910 年代至 1920 年代初，伍廷芳的证道学宣传将证道学——尤其是其国际主义理念——塑造成中国社会改良的有效理论，并作为调和中国境内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工具。随着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扩张，社会改良的需求逐渐转化为民族救亡的迫切需求。1920 年代中期中国兴起的教育权运动和反基督教示威活动，都与反殖民主义有关。中国人抵制基督教并非出于反宗教情绪，对基督教传教士文化殖民的警惕才是抗议活动更重要的动因。基于相同原因，中国人同样视外国人融合东西方思想为危险之举。他们难以辨别“普世兄弟情谊”与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本质差异。然而，尽管证道学教育运动和伍廷芳的证道学著作已被中国人遗忘，但参与该教育运动的中国证道学者们曾在中国教育界积极活动。更重要的是，伍廷芳证道学宣传中的诸如人权、素食主义等理念，至今仍被大中华地区民众铭记，并作为社会改革运动持续实践。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伍廷芳支持辛亥革命并代表革命派一方在上海进行谈判。他于1912年初短暂担任南京省政府司法部长。据他的法律背景及在外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大力提倡独立的司法体系。此后，他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并成为宪法会一员。虽然他反对孙中山成为“非常大总统”，但在孙任职后还是追随他。他最初任孙中山政府的外交部长并在孙中山外出时为其代职。1917年，他简短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理。他于1917年9月至1922年6月任外交部长，并在1921年5月至1922年6月期间同时任财政部长。伍廷芳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不久辞世。

虽然身任外交及财政部长双职，在他生命最后三年中伍廷芳为证道学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在他78岁时，身居上海申江的他大力推广证道学。他最初将该学命名为“道德通神学”，后命名为“天人名道学”，最终采用“证道学”一词。他对这个最终中文命名有如下解释：

“道德通神會改名證道學會之原因

此會名由英文翻譯其英文係Theosophical Society 按照原文字意。是“神智會”。查近日所刊英華字典。譯解“通神會”。惟恐閱者未知內容。疑本會與鬼神通處。誤為旁門左道。故添道德二字。表明宗旨正大耳。近仍有西士函評通神二字尚未妥當。請斟酌再改。是以與友人研究討論。再定名證道學會。其理由詳述於下。僅按世界宗教。其原皆出於天。其所研究主張之理。即天與人關係之理也。若泛言天道。而忽略人事。或徒論人事而蔑視天道。均不能以天道管攝人事。及以人事證明天道。繁言冗說。終是不明。不明即不通。欲恃此化導眾生。甚難覺悟。故談天道者必須有統系。有證據。以科學之條理。求大道之指歸。切於人事。當於人心。使人易知易明。不使人迷惑失據。天道人事。一以貫之。到此境界。謂之天道人道。均無不可。惟此種道理。經數千年宗教家道德家反覆陳說。尚苦其未明。故中國漢代儒家董仲舒云。“天人之際。甚難明也。”即指此理而言。今將神人死生及靈魂肉體種種未易說明之道。求所以明之。故定名為證道學會。“

每周四伍廷芳都会邀请中西会员到其家中探讨证道学：各宗宗教的真正教义，天地自然的至深奥妙，人的真正构造等等。据学员所述，伍廷芳每逢公务闲余，总是充满热情地对中西会员谈论证道学及隐匿性科学。

显然，伍廷芳公开演说证道学的活动在第一个学社成立前就开始了。据考，报界报道伍廷芳于1916年3月12日受上海上贤堂之邀进行以“灵魂与身体之关系”为主题的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演讲。

“三月十二日四時。上海尚賢堂請通神社伍廷芳君演說人之靈魂與身體之關係，到者數百人。(《伍廷芳演說靈魂》，《教育週報》(杭州)，第124期，1916年)”

1921年6月，伍廷芳翻译并发表了安妮·贝森特 (Annie Besant) 所著的《证道学指南》。1921年7月，他写了并发表了《证道学会要旨》。在该文中，他阐明了为何采用证道学为名的道理。需特别指出的是，伍廷芳博士当时同时兼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1922年2月14日，伍廷芳翻译并发表了安妮·贝森特的《因果浅义》。该著于他在1922年6月23日辞世前四个月发表。

1923年3月8日，申江证道学太阳会所在他辞世后发表了《伍廷芳证道学说》。这是一部关于伍廷芳对有关证道学问题的答案的书籍。在该书的序言中，有对伍廷芳如下赞许“伍公廷芳中华民国之大贤人也。生平不苟言行，不求奢华。事事以道德为准绳。”该书与伍廷芳的三部作品《证道学要旨》，《因果浅义》及《证道学指南》一起发表成集。该集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找到，《因果浅义》及《证道学指南》的独立版本则无处可寻。

伍廷芳生活在证道学成立及其最初半个世纪的年代里。他与学会的初期领袖同时代。他是否亲身见过他们，这不得而知，但他对这些领袖诸如比他小五岁的安妮·贝森特的敬仰是显而易见的。

在1914年发表的《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一书中，他不止一次提到安妮·贝森特：

“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比美国的更加苛刻严厉，近乎于禁止移民。不仅法律对中国劳工横加约束，对中国商人及学生也实行禁止。安妮·贝森特女士在1912年在英国发表的一篇“大英帝国的有色公民”演说中不仅驳斥她自己的国家的偏见，她还提到一个读者们，尤其是澳大利亚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她说：“在澳大利亚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正在发生。在那里的气候中人的肤色自然变深，澳大利亚人与黄种人的肤色相近。一段时间过后，本国人是否能在澳洲留居也可能成为问题。在那里白种人比有些印度人还黑。”在这个不争的事实面前，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是否澳大利亚政府放弃种族歧视并且促使议会废除或者起码改进关于黄色人种移民法的时候已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经到了？”

伍廷芳还大力提倡素食主义。在同一本书中的结尾部分，第17章关于运动的话题，他写道：

“我是一个坚定信仰自然，健康和慈悲的生活理念的人。我很感兴趣地在大英百科词典里频繁读到食素者成为运动健将的事实。他们赢得以下体育荣誉：柏林到德雷斯顿125英里步行比赛；1901-1902年Carwardine杯（100英里）及1901-1902 Dibble Shield（6小时）自行车赛；1899-1902连续四年英国非职业网球赛冠军；1902年非职业壁球赛冠军；印度自行车冠军（三年）；1896年苏格兰半英里跑步比赛；1902年4-13小时非职业自行车赛世界纪录；约克郡100英里跑步冠军（1899，1901），网球金牌（5次）。我虽没有更新的数据，但以上事实对法国天主教组织Sarbonne的Gautier教授所说的食素者缺乏精力和意志力一说提供了充足的反面证据。我在此引用美国密西根州Battle Creek疗养院院长及医生J.H.Kellog对我所说的事实。Kellog医生是个多年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虽然年过六旬但和四十岁人的精力不相上下。他说他每天工作16小时但没有丝毫疲倦。证道学会的会长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女士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据可靠的消息说，她食素起码35年，很少有65岁的非食素者能比得上她的精力。食素者可能有其他不足之处，但缺乏耐久力肯定不在其中”。

这里伍廷芳又提到了安妮·贝森特。事实上，1922年5月13日，伍廷芳博士从广州给安妮·贝森特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夫人：

听说您要访问悉尼，我和上海土星分会的负责同志们诚挚地邀请您来上海。该分会成立已有数年，发展势头良好。会员们自然希望会长能到他们的分会来访问并发表讲话。

当您决定来上海时，我希望您能来，我想向您发出最诚挚的邀请，请您到广州做客。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行动，在人民中间传播证道学真理。关于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我们可以在见面时讨论。

恭候您的早日回复。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此致敬礼，
伍廷芳"

安妮-贝森特于 1922 年 7 月 12 日回信：

"亲爱的先生和兄弟：

目前我恐怕还没有机会访问中国。副会长可能于明年访问土星分会。

如果我有幸来到贵国，我将欣然接受您的邀请。

衷心祝愿，
安妮-贝森特"

由于伍廷芳博士于 1922 年 6 月 23 日去世，他未收到这封回信。

伍廷芳在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证道学分会 - 土星分会三年后辞世实在是证道学的一大损失。他是土星分会的幕后十分活跃的推动者。早在 1916 年，他就用中文公开讲授证道学。在土星分会 1920 年的会员登记册上，他被列为美国学会的成员。他于 1916 年 8 月 23 日在美国克罗托纳(Krotona)正式加入了证道学学会，尽管早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为证道学学会积极活动和工作。他很可能是在美国执行外交任务时成为美国学会会员的。他在美国生活了大约 10 年左右。作为一个精通中西语言文字，有权利及影响的人，他最适合不过翻译证道学著作及在中国普及证道学。他辞世时已是 80 高龄。但是，他的遗作得以保存，他为证道学所选的中文名也一直广泛应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这个名称被重新使用。

在他去世后，有人于 1922 年 7 月 8 日写信给安妮-贝森特，为唯一真正的中国分会 -- 太阳分会申请分会宪章。这是伍廷芳博士一直想做的事情。用中文书写的申请书翻译如下：

"致安妮-贝森特博士：

我们，以下署名的中国上海证道学学会土星分会成员，希望成立一个中国分会，特此申请以上海太阳分会的名义授予我们特许状。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我们三年来隶属土星分会，相信现在是成立我们自己的分会的时候了。

我们已故的尊贵会员伍廷芳博士对此事特别感兴趣，并一直与我们就申请特许状一事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

因此，我们认为将他的名字作为创始人之一是合适的--他已经表示接受会长一职--鉴于他对中国的证道学事业一直表现出的个人和实际兴趣以及他对证道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他的名字将被载入我们学会在中国的未来史册。

我们认为，只有证道学才能将中国的三大宗教团结起来，通过传播证道学的教义和理想，再加上中国人民的日常实践，我们的国家才能再次在世界各国中占据其应有的地位。

向您保证我们对您的完全奉献和忠诚，并向所有兄弟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献给您兄弟般的致礼，

Dr. Wu Ting Fang/ Hee Wan A. / H.L. Park/ Tseng Yue Sung / Dr. Chan Git Cho / G.F.L. Harrison/
Tong Sum Chuen / Dr. Lin Chin Hua / Lou Lum King / Kee Chan Lun / Chan Sun Yuen / Oakland
Lu

太阳会所 (中文名为申江证道学社太陽会所) 的会章于 1922 年 8 月 8 日颁布。

1924年，上海分会新任会长多萝西·M·阿诺德 (Dorothy M. Arnold) 重组了中国的证道学运动。她在上海开展的证道学运动得到了香港分会创始人兼会长马尔科姆·马努克 (Malcolm Manuk) 的支持，这位亚美尼亚人出生于印度。马努克曾任乳业公司秘书，因公频繁往来悉尼。他于1910年8月3日以阿迪亚分会会员身份加入证道学会，直至1932年逝世始终保持会员身份。正是他于1920年将伍廷芳的信件转交库森斯 (Cousins) 并促成二人会面。马努克还积极参与了中澳证道学网络的建设。土星分会部分前成员，如H.P.夏斯特里 (H. P. Shastri) 及美国犹太证道学者亚历山大·霍恩 (Alexander Horne) ，亦积极参与重建中国证道学运动。霍恩致力于出版中文证道学文献，并负责上海分会设立的“中国出版基金” (China Publication Fund) 。此外，阿诺德支持中国人于1924年以“黎明分会” (Dawn Lodge) 之名重启中国分会；H·P·夏斯特里则于1925年联合中国证道学者们创立“中国分会”。在阿诺德的指导下，中国证道学者们更注重向中国人传播证道学思想。1925年，阿诺德与证道学会中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国成员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证道学学校。



培成女校（贝森特女校 | Besant School for Girls | 今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上海证道学会黎明分会的会长蒋君瑞(Kinson Tsiang)表示：“虽然上海有两三个分会，但都是由外国人建立的。直到中华民国十年，一位深谙本会宗旨的中国学者伍廷芳博士才组织成立了名为‘太阳’分会的新分会；但他在世时无人能维系分会运作，该分会逐渐消亡。”

Josephine Ransom 所著的“证道学75周年年册”1936年记事中，她写道：

“A.F.Knudsen先生被委任为东亚总代表。他和夫人将上海作为中心，因为上海比香港更方便接触真正的中国。相当一部分证道学著述已被翻译成中文。”

确实，Knudsen先生在1938年1月21日在阿迪亚展示了一本名为《证道学》的译著。这本书是何时翻成发表的不是很清楚。译者是一位“鸳湖金慧莲先生”。这是一本比较全面的书籍，近乎于中文证道学手册。

现存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的两个名为《师训》的中文版本。其中一版有Knudsen于1937年4月17日所作的序。但译者不详。另一个是更早的不明日期的版本，译者为三水林浩华。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在《证道学会简史》中，在1937年有这样对C.Jinarajadasa先生从日本返印度的途中的记事：

“在归途中他在上海停留更长一段时间。他进行了一次公众演讲，在学社多次发言，并在“真因果会馆”作了以佛教为题的演讲，该演讲被翻成了中文。”

《证道学会七十五周年年册》中，在1939年有这样的报道：

“Knudsen先生在上海在学者的帮助下，准备将C. Jinarajadasa所著《证道学要领》及安妮.贝森特所著的《古老的智慧》翻成中文。”

这些书是否最终被翻成中文不是很清楚。到目前为止，这些书的中文译作还没被发现。

在1937年3月5日的一封致Dr. G. Srinivasa Murthi的信中，时任会长代理的 A.F. Knudsen 写 道：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在华已解散的证道学学会分会的名单。在这里很难找到它们的任何踪迹，就连Dorothy Arnold小姐也没有对它们实际的记录。到目前为止，除了那些已经明确退出的会员，她没有给我任何中国老会员的名字。那些在坚持学习证道学，但不懂英语的人从来不认识她，也不会来参加讲英语的聚会。一个年轻人看到我外套上的证道学学会胸针，后来告诉Eiswaldt先生，他见过一位中国老先生，他的外套上也戴着一个类似的胸针。要找到这些“失散成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可能会在中国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示”，请他们与我或分会联系。我也会在汉口尝试联系任何可能仍感兴趣的人。伍廷芳博士是一位真正的强人，这场运动随着他的逝世而熄灭了”。

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证道学七十五周年年册》中，1944年有这样的不祥的记事：

“在缅甸，荷属东印度和菲律宾的学会都遭日本人毁灭。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学会也难逃厄运。”

经过二战和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道学学会在中国不复存在。1941年12月8日战事开始后，香港分会就停止了运作。1946年12月20日，9名会员举行会议，考虑恢复香港分会，但恢复工作并没有展开，香港分会一直保持沉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寂。直到1959年5月15日，总部收到香港分会的一份分会宪章申请书。该申请由冯公夏先生（K. S. Fung）作为会长与其他7位成员签署，其中包括负责财务的施刚巽先生（K. S. Sze）。1959年7月30日，阿迪亚总部签发了新的会所成立宪章。新分会随后的活动没有任何记录。但是，由朱宽翻译的另一版本的“*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译名为《礼足恭听录》，在1961年由冯公夏先生出资在香港发行并于1972年由施刚巽先生出资重印。冯公夏先生经营恒泰丰公司（Hang Tai & Fungs Co.），施刚巽先生经营金星有限公司（K. S. Sze & Sons Co.），是香港著名人士。直到此时，伍廷芳所创的“证道学会”一词一直被使用。这本书与前面提到的七本书，是阿迪亚图书馆中唯一的中文书籍，也可能是仅存的中文书籍。

目前，中国尚无证道学学会。在“广布证道学知识”的学会宗旨下，我们不能忽略有14亿4千8百万人口的中国。在证道学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会的倡导下，一个以向华语人群，特别是中国人，以及约5千万海外华侨推广证道学为目的“中文项目组”于2011年12月在新加坡学会成立。直至今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证道学中文网站 www.chinesetheosophy.net，并以该网站为起点作为传播证道学教义的渠道。好在中国上网率高。在14亿4千8百万口中，据2022年7月31日统计，约有10亿网民，相当于亚洲34.4%的网民。”中文项目组“的任务包括循序渐进地将证道学著作翻译成华文并上载到网站，同时协助网上对证道学的讨论。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已经在中文网站上上载了阿迪亚现存的八部早期证道学书籍。更多的书籍，文献和讲座在近些年被发表和刊载。更多的活动会日渐展开。

我们将学会正式名字回复到由伍廷芳命名的“证道学”，以继承先生遗志。该名从1920到1972年一直是学会的中文正式会名。值得一提的是，证道学中文项目组成立于伍廷芳出生地新加坡，继续伍公未了之事业。

撰写：钟山儿（2025年11月29日更新）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会长

证道学学会印度太平洋区副会长

翻译：杜巍巍

参考资料

Ransom, Josephi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证道学简史*”

Jinarājādāsa, C. *The Golden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Jinarājādāsa, C. “*证道学金色年鉴*”

Ransom, Josephine,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Ransom, Josephine, “*证道学75周年年册*”

Wikipedia

维基百科

Wikipedia (Chinese)

中文维基百科

Baidu Encyclopedia (Chinese)

百度中文百科

Wu, Ting Fang, *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in English)

伍廷芳 “*一个东方外交官眼中的美国*” (英文)

Wu, Ting Fang, *Information for Enquirer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证道学指南*” (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译文)

Wu, Ting Fang, *Outline of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证道学要旨*” (中文)

Wu, Ting Fang, *Elementary Lessons on Karm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nie Besant's writings)

伍廷芳 “*因果浅义*”(Annie Besant 著述中文译文)

Wu, Ting Fang, *Dr Wu Ting Fang's Dialogues On Theosophy* (Chinese)

伍廷芳 “*伍廷芳证道学说*” (中文)

TS in China, *Theosophy* (Chinese) (1938)

证道学在中国 “*证道学*” (中文) (1938)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undated)

证道学在中国 “*师训*” (中文) (日期不详)

TS in China,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7 April 1937)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证道学在中国 “师训” (中文) (1937年4月17日)

Chu, Maurice,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Chinese) (1972)

朱宽 “礼足恭听录” (中文) (1972)

Internet World Stats –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英特网世界统计资料 www.internetworldstats.com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证道学百科全书》中收录的有关中国证道学的条目

中国的第一个会所是 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土星会所，由 Hari Prasad Shastri 先生担任主席，G. F. L. Harrison 先生担任秘书。据 1924 年的年报中的报道，该会所显然已更名为上海会所。1922 年，在上海成立了太阳会所。证道学在中国往往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各地的西方人开创的。

1923 年，又有两个分会成立，分别是位于汉口的汉口分会和位于香港的香港分会（由 Manuk 先生领导）。1924 年，上海成立了黎明分会，由 Kinson Tsiang 领导。该分会由年轻人组成。1925 年，布拉瓦茨基分会也在上海成立，由多萝西-阿诺德小姐（Dorothy Arnold）领导。该组织由居住在上海的俄罗斯人组成，俄文版证道学书籍的匮乏是该组织面临的一个问题。在此期间，阿诺德还开展了儿童教育工作。贝桑特女子学校于 1925 年开办。这所学校办得很成功，到 1928 年，学生人数已增至 340 人。1930 年，学生人数增加到 448 人，许多申请的人不得被拒之门外。为了专注于学校的工作，阿诺德小姐不得不辞去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1925 年，美国学会的 Edith Gray 访问了上海分会，并举办了关于因果业报和轮回的讲座，这促成了因果业报和轮回行动组（Karma and Reincarnation Legion）的成立。他们出版了《远东证道学》，每两个月一期。他们翻译了一些证道学书籍，如《在真师膝下》、《证道学》和《生命之谜》。到 1925 年，在中国南方的厦门、汕头、澳门和海口建立了证道学中心。在澳门，报纸上关于轮回的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使轮回和证道学受到大众的关注。报纸上的交流内容随后被印刷成书。同年，天津成立了北中国分会。1928 年，在中国的 M. Manuk 先生担任全球会长的中国代理。不过，后来在中国的证道学活动归属于东亚会长代理处。1937 年，基纳拉贾达萨（C. Jinarājadāsa）访问了这些分会。同年，证道学学会会员还在上海成立了素食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和香港的证道学活动停止了。1949 年后，除了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外，所有证道学团体都停止了活动。然而，香港的证道学学会只是间歇性地开展活动。到 20 世纪 90 年代，那里已不再有任何证道学会议或活动。中文的证道学文献大多是用古典文体而非现代文体或白话文书写的，因此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相对较难阅读。V.H.C.